

黃帝與中華文明

董其昌書



曲辰 任昌華 著

◎ 中国华侨出版社

黃帝與中華文明

任昌華



曲辰 任昌華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帝与中华文明 / 曲辰, 任昌华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4.6

ISBN 7—80120—818—8

I. 黄. . . II. ①曲. . . ②任. . . III. 黄帝—人物研究—史料 IV. K82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7906 号

● 黄帝与中华文明

著 者 / 曲 辰 任昌华

责任编辑 / 蒋泽新

责任校对 / 钱志刚

排 版 / 楚先生影像工作室

制 版 / 金巴黎图文设计照排公司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 18.5 字数 / 447 千字

印 刷 / 张家口市印刷总厂

版 次 /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00001—5000 册

书 号 / ISBN 7—80120—818—8 / K · 181

定 价 / 39.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邮 编: 100029

发行部: (010) 64443051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E—mail: zghqcbbs@163.net

传真: (010) 64439708

目 录

绪 论	1
上 篇： 中华文明的起源	27
第一章 黄色的人种	27
第一节 世界人类、人种与地域文明	28
第二节 黄色人种的摇篮	31
第三节 人种与地域的关系	40
第四节 黄色人种的形成	43
第二章 悠久的历史	45
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	47
第二节 细石器时代	55
第三节 新石器时代	75
第四节 文化与社会历史变革的关系	88
第三章 博大的哲学	92
第一节 中国古典哲学产生的时间	95
第二节 中国古典哲学产生的地望	110
第三节 中国古典哲学的本质性特点	115
第四节 中国古典哲学传承中的嬗变与历史原因	124

第四章	“有熊”名义与地望-----	149
第五章	“青丘”与“轩辕之丘”-----	166
第一节	“青丘”地理位置考-----	171
第二节	“轩辕之丘”今所在-----	174
第三节	“轩辕之丘”的文物考古之证-----	187
第六章	黄、炎同父不同姓的历史原因-----	192
第七章	“有熊”振兴与黄帝的睿智-----	204
第一节	黄帝的聪明源于学习哲学-----	206
第二节	黄帝的业绩在于对哲学的运用-----	209
第三节	黄帝最大的历史贡献是对哲学的传播-----	215
第八章	黄、炎分治与蚩尤之叛-----	218
第九章	蚩尤其人-----	223
第一节	蚩尤是塞外人-----	226
第二节	蚩尤是黄、炎臣属-----	229
第三节	蚩尤死葬于涿鹿-----	234
第十章	涿鹿之战-----	236
第十一章	关于黄帝的“景云之瑞”-----	245
第十二章	指南车与指南针-----	252
第十三章	阪泉之战-----	255
第一节	黄帝并未杀炎帝-----	255
第二节	炎帝非神农-----	256
第三节	阪泉之战的时间、战场、对象、因果-----	263
第四节	阪泉地理位置记载正误辨-----	267
第十四章	关于涿鹿两战的若干历史问题-----	278
第一节	野蛮与文明时代的科学界定-----	279
第二节	涿鹿两战的时代判断-----	292

第三节	涿鹿两战的斗争性质-----	310
第四节	涿鹿两战的深远历史影响-----	318
第十五章	“合符釜山”考-----	328
第十六章	黄帝命青阳再治少昊-----	336
第十七章	黄帝使炎帝重新司南-----	343
第十八章	九黎南迁与“三苗”名义-----	350
第十九章	轩辕黄帝的死因-----	356
第二十章	桥山考辨-----	361
第一节	桥山地名考-----	362
第二节	桥山地理位置考-----	367
第三节	桥山黄帝陵祭祀考-----	375
第四节	桥山黄帝陵遗址、遗迹、文物考-----	379
第五节	伪造“桥山”源流辨-----	385
第二十一章	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	401
第二十二章	龙是中华民族的族徽-----	413
下 篇：	中华文化的历史嬗变-----	433
第二十三章	文化嬗变与民族兴衰之关系-----	433
第二十四章	黄帝的思想与政治-----	440
第一节	民本思想-----	442
第二节	法制思想-----	454
第三节	经济思想-----	463
第四节	军事思想-----	469
第五节	哲学思想-----	473
第二十五章	夏、商、西周的“神道设教”-----	484
第二十六章	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	491
第一节	“百家争鸣”的历史背景-----	495

第二节	“百家争鸣”的本质和历史作用-----	499
第三节	孔子对中华民族思想精神的历史贡献-----	501
第四节	老子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危害-----	516
第二十七章	秦汉封建神学理论的形成-----	526
第一节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527
第二节	汉武帝的敬事鬼神-----	534
第三节	董仲舒构建封建神学思想理论体系-----	535
第二十八章	魏晋南北朝兴起的虚无玄谈之风-----	544
第二十九章	隋唐时期的宗教泛滥-----	555
第三十章	宋明之际的“理、气”之说-----	563
结 语：	文明的发展取决于文化进步-----	577

绪 论

本书的写作，旨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轨迹，探讨中华民族文明起源及其重要的历史原因。

研究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研究和探讨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问题，是为中华民族现在和将来的高度文明建设，从中华民族的客观历史兴衰中提供一种多方面历史借鉴，一句话，就是要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历史性复兴服务。这，是中国历代史家治史所一贯秉持的严肃态度与历史责任，不论他能与不能。舍此，为了著书而述史，为了述史而研究，便毫无意义。

民族的发展与历史振兴，需要从民族历史兴衰的经验教训中取得借鉴，其理至为简明。譬如，一个人要在这个社会上很好地生存、发展，只有既客观地知道自己的优点与缺点，又了解生存环境诸种条件对己的有利与不利，更善于洞察事物客观发展之趋势，他才能够在实际生活中，时时注意扬己之长，避己之短，学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审时度势，制定正确的目标，运用正确的方法，不失时机地把握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做好要作的每一件事情，从而创造出较好的生存环境，做出很好的业绩。反之，既无自知之明，又缺乏对客观环境的实际了

解，只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和想象去办事，那就如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一样危险，难免摔得鼻青脸肿。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与发展，必然要引起文化全球化的竞争、激荡、交流与融合，因为，政治、经济本身就是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激烈竞争的国际大环境中，要达到发展自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目的，同样需要知己知彼，有一种历史与文化上的自觉性，这是一个与兴亡存废息息相关的极其重要的大问题！但这比一个个人要做到“知己知彼”就难得多了。作为一个民族的“知己”，就需要正确地了解自己的民族历史，民族历史文化，以及民族历史文化的优劣和造成文化优劣的客观历史原因。只有如此，才能够正确地处理好历史文化的批判与继承问题，才能够真正继承和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批判和抛弃那些非科学的、落后的文化糟粕，才能够使全民族通过吐故纳新的先进文化建设，得到“强身健体”，在世界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激荡、融合过程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特点与个性；作为一个民族的“知彼”，就需要充分了解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以及文化优劣与原因。只有如此，才能够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之中，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向人家学什么，怎样学，拒绝什么，如何抵制。如此，才能够在全球性的文化交流、激荡、竞争、融合风潮中，不患“伤风感冒”，既能学到各国各民族先进、优秀的文化以提高自己，又不受某些腐朽、没落文化的侵害。

作为一个民族，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的相互交流、激荡、竞争、影响、融合、发展过程中，其“知己知彼”所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民族历史文化只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能够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了“知己知彼”。

即使只就历史文化方面而言,我们也不能够有这种错误的认识。实践早已一再地证明,由于种种原因所致,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文明发展进程等,都存在着不少模糊的认识,有些甚至是错误的认识。

一、关于历史问题。

按照中国历史记载及传统认识,是轩辕黄帝肇造了中华文明的国家之制,组织了各方面的人才进行一系列学术研究和治理国家,施行文明教化,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如:史传黄帝命仓颉整理增创文字,用之于述史记事;令羲、和等进行日、月、星辰之观察,开展天文学研究;使大挠、容成造甲子,定历法,以利于顺时而树;让伶伦等铸钟、制定音律,以利于乐器合奏,陶冶人之性情;请岐伯、雷公等研究医药,创建中医学理论,以有益于防病、治病;黄帝亦造舟车、立典章、并分封百官治理中华各地,以使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各方面都得到发展;黄帝正妃嫫祖,倡导养蚕、以发展纺织业,收“垂衣裳而天下治”之功……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尊黄帝为文明始祖,历代都将祭祀黄帝列为国家大典,并认为中华文明的历史至今已有近五千年之久!

但是,自西学东渐之后,中国在史学研究中就产生了“疑古”学派,提出了“东周以上无史”论,将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砍掉一半。如此,不仅众多古史籍所记载的五帝时期“不存在”了,就连夏、商历史也有很多人不承认了。这中间,一些为强权国家侵略服务的国外学者,也大造舆论,否定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有名噪一时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有著名的《尧舜禹抹杀论》,说什么尧是香炉,舜是蜡烛台,大禹不过是一条爬虫等等。在盲目崇洋的社会风气之下,中国人对这种诋毁中

华文明历史的辱祖之说，非但不能做出应有的反驳，甚至是唱而和之。直到本世纪末，依然有人坚持认为，五帝时期，乃至夏、商历史，都是“神话”，是反动的儒家特别是孔子等为统治阶级服务，才将神话改写成历史的。说：“神话的大量转化为历史，在阶级社会，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现在是理直气壮地“将一部分古代史还原为神话”的时候了。还有的学者撰文重复白鸟库吉的论调。说：“黄帝原本无其人，无其说”，“就是大禹有人说也不是实有其人，而是一条虫，是代表古代某一氏族的图腾，这也能说得过去”……

中国人由近世工业技术落后的被动挨打而崇洋怨祖，外国列强的御用文人欲借此否定中华古老文明历史，贬斥中华文化，进而建立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人的思想控制，曾为一段永远难忘的历史事实！

历史，是一种事实的时空存在过程，且有文化遗物存在而永难磨灭。它既不以任何人的否定而消失，亦不依后世人对其的篡改、曲解、附会而变样。而考古学研究就是一切歪曲、附会、否定历史的克星，这是由其研究的唯物性质所决定的。考古学虽然亦会受研究者思想、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的影响而走些弯路，但这一学科在研究方法上的历史、唯物、辩证、求实本质不会被改变。正因为如此，冲破“疑古”思想的束缚，正确地认识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中国的考古学研究是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的：先是，伴随着殷墟甲骨文字的发现和研究，学者们终于对《史记》有了新的认识，因为甲骨刻辞中的商代帝王世系与《史记》所载基本一致，这证明司马迁记述商代历史，是有真实的历史根据的。商王的历史，否定不了；接着，考古工作者按着《史记》等古籍所记载的夏王朝主要活动地望，进

行了大量夏文化的探索与研究，结果又证明了中国古史所载的夏王朝不虚，亦同样是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现在，在学术界对夏、商、周历史有了比较一致认识的基础上，国家正式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无疑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里程碑。即使如此，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实际认知，亦只恢复到了四千一百年左右，还缺“五帝时期”七代帝王五百年左右的历史！

现在，对于五帝时期的历史，学术界的基本认识，可以说还是相当混乱的，各种各样的争论是相当激烈的。这中间，有一些著作的观点，是毫无依据、相互矛盾而难自圆其说、经不起推敲的。例如：关于轩辕黄帝的出生地，有河北说，有河南说，有山东说，有陕西说；对于黄帝的葬地桥山，又有涿鹿桥山，陕北桥山，甘肃正宁桥山，子午岭桥山，陕西中部桥山，北京渔子山等多种说法。一个人的出生和死葬之地，只能各为一处，其余都是假的。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人能具有“分身术”。凡此之类，追根溯源，又与班固、皇甫谧、魏收、萧德言、王钦若等人的笔改史事、不负责任的误抄历史地名、以及秉承帝旨曲相附会，有着最直接的关系。谬说之传，害人不浅；至于“五帝时期”的社会形态，学者们的论点就更加杂乱：有称黄帝、炎帝、蚩尤、唐尧、虞舜等为“氏族”的，有称作“部落”的，有论其为“军事民主制时代”的，也有说其时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凡此之类，都是研究中国的古史，生搬硬套西方学说，以西方标准为标准，用刘易斯·亨利·摩尔根，以及恩格斯的观点，图解中国古代历史、食洋不化而造成的结果；还有说黄帝、炎帝、蚩尤都是“游牧民族”的，或说他们“自西方游牧先入中部”，尔后东迁。或说“自甘青高原东迁至黄河中下游”的。甚至，有的学者在自己的史学著作中，

把中国古代氏族、古代民族、历史人物、乃至朝代，都要一个不落地都东、南、西、北地“迁徙”上一番不可！这种既无史籍记载可依，又无考古学发现与研究所证，更不懂人类原始社会发展史方面最基本常识的凭空之说，显然又与“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恶劣影响不无关系；至于根本不顾历史、历史地理的记载，不顾历史遗址的存在，以及大量出土文物之证，硬说“我对阪泉、涿鹿地望的考定，即它们均应在今豫西的巩义市境内，而不应在冀北”之类发言，则同现今到处争历史遗址的旅游景点开发有关。我们认为，既然身为史学工作者，又要研究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就应当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以民族兴衰为己任，以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观点做研究，而不应该为某一地方的眼前旅游经济开发去曲解历史。金钱如果介入到历史研究之中，中华民族的历史便会面目全非，被解释个一塌糊涂！

上述客观存在的事实和原因，都说明我们对自己民族的文明历史研究，是很不够的，在这方面的研究任重而道远。而要搞清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五帝时期”这一关是绝对绕不过去的。特别是对于黄帝、炎帝、蚩尤，他们相互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们之间的战争又各是什么性质？这一时期的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历史变革？它给中华民族的历史和历史文化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等等，都是必须要搞清楚的。不然我们就很难对这一段历史做出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认识。

二、关于文化问题。

在民族历史文化的认识上，我们同样不能够说很了解的话。因为，客观上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研究，是做得很不够的。唯其如此，我们就一直在对历史文化的批判、继承问题上，没

能够处理得很好，把很多优秀传统文化当成了批判的对象，而对一些文化糟粕却进行了肯定和吹捧。在这方面，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中国“四维一絜”的唯物辩证哲学思想体系不了解、不认识、不承认。甚至可以说，这是正确认识中华文化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中国，是全世界唯物辩证哲学思想产生最早的国家。中国这种古老的哲学在古代单称一个字：“道”，它的经典就是《易》，哲学理论就称作“道理”，学哲学而有心德，就体现为“道德”。这种哲学将事物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称作“阴”“阳”，道就是阴阳异性互感、互动、互渗、互依、互根，以及阴与阴、阳与阳的同性事物相互排斥、竞争、互灭、和合而促进事物产生变化之规律的称谓。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这种哲学将宇宙间天体的运行规律称作“天道”，将地球物理及万物变化规律称作“地道”，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规律谓之以“人道”，认为天道、地道、人道这三个方面是互为影响的有机统一体，是天、地、人相互交感，而使得事物产生变化。这就是天、地、人、时合一而论的理论根据。而一切事物的变化，都是伴随着星转斗移的时间过程而显现出来的，这就是中国人讲时变、重变通、注重时机的把握、依时而动、与时俱进的哲学根源。在几何学及空间理论中，一维是直线，二维成平面，三维构成立体，四维形成立体变动。中国古代哲学将天道、地道、人道、时变合为一个“四维一絜”的哲学思想体系，以之研究人类社会与万物变化，用之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此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抽掉了“四维一絜”这一哲学的核心性文化本质作用，其文化就根本谈不上博大精深。因为，无论什么样的文化，其本质性的体现，都是一种哲

学思想。所以，这种“四维一絜”的立体变动哲学思想体系，才是真正历史、唯物、辨证、求实，而又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是一种科学地观察、研究、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论。

由于这种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产生于尚无文字为载体而行教、学、以作传播的时代，按最保守的估计，至少也在距今七千多年以前。为了解决教、学上的困难，使之得以传承和传播，中华民族的先祖就创造出了一种图案画的方法为其理论载体，即先画出代表阴、阳的两种符号，再以天道、地道、人道组成八个象征天、地、风、雷、水、火、山、泽的图案，以其作为哲学上“天地定位，风雷相薄，水火相射，山泽通气”这样一个大化流行的最基本理论框架。然后，把它悬挂起来，作八八相重，就能演变成象征六十四种不同事物变化发展规律的图案，就能够完成教、学任务，达到传承与传播哲学思想的目的了。这是因为，这种经过以八经卦相重的六十四个图案性别卦挂画，每一个挂画都具有“天道”、“地道”、“人道”这三方面的不可忽缺性包含，且三方面各具阴阳而成“六”爻，再以上经卦代表事物变化之外因，下经卦作为事物变化之内因，从下卦最下爻向上六爻发展为“时变”过程，最后通过象术的运用、同性相斥和异性相引自然规律的解说，就可以演绎出论述天地间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道理了。这种图案性挂画，在无文字的时代，就以八种最基本的挂画为称，曰“八卦”；在有了文字进行注释、解说、阐明道理之后，就成为书籍，书名就依这种书是专谈事物变易，这种以图为主、以文字注释为辅、有条理地讲解事物变化规律的方法简易，而其所论事物变化的规律则千古不易这三方面涵义，定书名曰《易》。

中国的这种“四维一絜”的哲学，按历史记载，产生于庖

牺氏历史时代。其时是“养牺牲以庖厨”，为了解决无猎物而饿肚皮，学会了结绳为网捕捉活兽，人工饲养驯化为家禽、家畜的时代。是时，人们的生产生活观念是“以山为生存根本”；最初的农业种植生产，也同样发生在丘陵山地，其办法就是焚林垦荒，利用焚烧山林后的草木灰，以及长期的山林植被物遗留下来的大量腐植质肥田。而当时由于尚不具备治水抗洪能力，河川区的生产并不发达。因此，这一时期的人们在生产、生活、社会观念中，仍然是“以山为根”。其时的《易》卦排列是以“上卦山、下卦山”的《艮》（根）卦为首卦。后世的人们，便将这种以《艮》卦为首卦的《易》经“版本”，按首卦《艮》，上卦为山，下卦为山，有山山相连之象，称作《连山易》，简称《连山》；到了黄帝时期，不仅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且已能开渠、打井，在平川区耕种，水稻栽种也极为普遍了。正因如此，这一时期，人们的社会观念也由原来的以山地为“根”而转向以平地为“本”了。此正如《黄帝经》所一再强调的那样：“人之本在地”，“不重地则失其根”。由此，就将古《易》卦重新排列，以代表大地的《坤》卦作为首卦，并取象喻理，依大地生发万物，而万物又莫不归藏于大地之中，以言《易》道之理包含自然万物的变化规律于其中。因而命称这种以《坤》卦为首卦的“版本”为《归藏易》，简称《归藏》。所以，《连山》、《归藏》的首卦之变，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小问题，而是通过对首卦之列，反映出了不同历史时代的一种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历史观与价值观念。

由于黄帝极其重视以道立法，以法治国，一切礼仪、典章、制度的制定，一切思想言行，都是以哲学道理为指导，并以积极倡导、传播哲学思想为己任——“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

唯道矣”。这，就是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的历史根源：自从夏禹建立“父传子，家天下”的独裁政治制度之后，他便极端仇视哲学思想的传播。但一种久已传播于民间的社会思想，又是根本不能够进行“没收”和“销毁”的。有这种教人聪明智慧的思想存在，就不利于他实行变天下之公为一家之私的“家天下”独裁统治。——这就是他炮制《洪范》，“神道设教”，愚民以治的历史背景；此后，到了商王朝，迷信鬼神的思想泛滥到极点。可是，不仅用龟甲占卜，普通百姓是做不到的，更何况利用迷信鬼神聚众作乱，历来都是对独裁政权的一种最大威胁。商末，纣辛残暴，西伯谋以兴周取而代之，为了给日后的愚民统治制造出一种简单易行的愚民工具，他就研究利用哲学经典《易》进行占卜的方法，并为日后的占卜而改造《易》经，这就是《周易》出笼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历史上，西伯只研究了利用我国古哲学经典《易》经的占卜方法，尚未完成对《易》经占卜性经文的改写就死了。周王朝建立后，其子姬旦继父之业，“干父之蛊”，最终完成了对《易》经的改造，除在《周礼》中规定了“大卜掌三《易》”以为占卜之用外，还用行政手段在全国推广用《周易》占卜之法；春秋时期，中国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为阐发《易》道哲理，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人所共知。但到了宋代，朱熹却要滑头，他自己一生都依《易》经为根据，来建立他的“理学”思想体系。另一方面，他则一再强调《易》经的本质是卜筮……

上述历史事实，无论是从历史典籍记载方面，出土文物、文献方面，还是从《易》道研究、古文字研究、中国思想史研究、历史文化研究等方面，都有大量确凿证据可以证明。但是，如今的学术界多还按朱熹的调门吹，说《易》经原本就是“古